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历史探索

潘捷军

提 要：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史志学界对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探索。本文从3个历史阶段回溯这一历史过程，并着重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从首倡到争辩，再到形成共识和初步成果的探索历程，同时强调以习近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百年建党历史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学术研究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传承接续编修志书在中国至少已有上千年发展历史。自1921年以来，“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因而“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①。同样，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特别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地方志研究和编修实践工作，史志学界相应也就“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这一重大命题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这一过程具体又可分为3个历史阶段：一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三是从改革开放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下按这3个阶段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分析。

一 受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双重影响的早期探索

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国门洞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西方影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甚至呈泥沙俱下、良莠难辨之势。这些思潮都对当时的地方志编研活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双重史观影响下方志学界的有益探索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极少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方志和方志理论。^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前20年，进化史观基本主宰了中国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言：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不甚注意”，了解不多，更谈不上研究与运用。^③同时也正由于“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有着进化史观的思想背景，所以进化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渗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并对其产生了微妙影响”^④，因而虽然这一时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初创期，甚至当时连这一概念都不存在，正如列宁所言，“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⑤。但也应看到，以进化

①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第1版。

② 参见刘光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1919年第6卷。

④ 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⑤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史观为中介和发端,无论是从编纂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当时中国方志界已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具有宏观而非微观、间接而非直接甚至模糊而非清晰等种种特点,但其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呈现出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持续性特征。如果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例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振伦已经开始在方志研究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可以说,傅振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他是最早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①。这与他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必然联系。正如他晚年所言:唯李大钊先生讲《欧美史学思想史》,方使其“始知历史唯物主义”。李大钊当时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针对以往史书无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专门记载“王公世爵”“达官贵人”的现象,李大钊便十分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强调从人民群众中去寻求历史发展规律,探求社会前进力量。事实上,包括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内,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对时年20岁的傅振伦等一大批有识青年,“先入为主”式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瞿秋白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从苏联回国,并陆续向社会民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先进理论,以1924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第一部《社会进化史》等一批成果为代表,比之进化史观更为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不但已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而且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如当时就有评价:在时下中国,唯物史观正成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②显然,思想理论界的这种声势和影响,势必会对总体上归属于史学体系的方志学和编纂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1929年,傅振伦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中说道:“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鉴于史志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居今修志,应加改革”,特别“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社会嬗变……诚当今修志之要义矣”^③。这都清晰阐明了傅振伦早期方志思想的先进理念和进步倾向。而且这一理念和思想还伴随他方志生涯的全过程:“我以为我和旧志的编纂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以唯物史观作为修志的指导思想。”^④由于傅振伦在近现代方志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因而一定意义上也是业界发展的重要取向和标志。

无独有偶,1935年,李泰棻在其出版的同样被视为“近代方志学开山之作”的《方志学》专著中也明确指出,“方志,亦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将来纂志,内容资料,固须政治、社会双方并重,以期对于人类进化事实,叙述无遗”。同样,当年李泰棻在其参与编纂的《阳原县志》序中还说:“近半世纪以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须重社会关系,民生尤贵生产样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潮流,岂独能外?”这部志书因而也成为民国

① 薛艳伟:《傅振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② 参见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文化批判》1928年第5期。

③ 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

④ 林在勇主编:《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时期最早注意记述社会阶级关系的一部志书。^①

当然,由于受时代等多重因素局限,当时理论上的初步认识和修志实践的新探索也许还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画等号,但它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方志界实实在在的影响。

(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方志发展的主导倾向和积极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尽管由于受严酷的战争环境影响和艰苦的物质条件所限,我们党既不可能组织开展区域性大规模修志工作,也不可能组织力量对方志学进行系统性的专业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历史时期,除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共理论先驱者外,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忽视对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形式的关注,始终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这一事业的发展进步。

例如,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求学时,便已熟读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輿记要》等史志文献。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他几乎每到一处都遍寻方志并加以研读。由于无法携带阅后需“忍痛割爱”,他几乎到了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的程度。这既体现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继承,同时地方志书无疑也在他领导革命、指挥作战过程中显示了重要价值。也正因为毛泽东深谙其价值意义,1941年8月,他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明确要求:中央在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时,应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使其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起草“(三)关于收集资料的方法”一条时,他还特别强调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②。这也是中共中央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及地方志的资政价值。1943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曾将清光绪《保安县志略》复印分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并在序言中特别指出,调查研究收集材料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③。

综上所述,从李大钊等的启蒙到毛泽东等的影响,从中共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为包括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在内的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梳理历史还会发现,与早期进化史观相比,唯物史观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影响日益彰显。尽管这种贡献未必局限于研究成果和新志的数量比重等外在形式上,甚至在当时的特定时期这种贡献也很难显示成就价值,但其内在力量却难以用数量形式衡量,其导向性意义更难以估量。其后的历史也已证明:中国共产党乃是推动包括地方志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样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探索的历史延续性。如果人为忽视以至否认这一过程,后期发展事实上也难以逾越。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与波折

应当承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受历次政治运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冲击,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和挫折。当然历史并未中断。这一时期具体

① 参见王景玉:《民国期间一部崭新的〈方志学〉——李泰棻〈方志学〉评述》,《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1—362页。

③ 参见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3页。

又可细分为几个阶段,而且各个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和成果——虽然未必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这一命题,而主要体现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修志实践和实际工作,从而使事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探索总体上仍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一) 新方志指导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尊重历史、继承传统仍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秀品质,对待地方志工作同样如此,而且这一时期特别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各级干部并指导具体工作。例如,196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时曾以当地的《荆门市志》等志书为例,语重心长地告诫地方有关领导同志:“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①

其次,当时已关注到以何种理念来编纂志书的问题。如1961年2月,徐特立、谢觉哉等在福建专题调研地方志工作时明确指出:旧志不管如何写,有时尽管未明文标明,但一般都反映了旧时代即封建社会的特点。志书是有时代性的,今天的社会制度与以往完全不同,因此志书也应有不同的编纂方法。^②同年夏天,周恩来在庐山期间,曾以《庐山志》为例指出:“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今的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他还说:“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③从而明确为新时期修志的指导思想点了题。

再次,与学术研究相比,地方志工作的实践性更强。因此,以什么样的理念、方法指导实践工作至关重要。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全国其他各方面工作和事业发展一样,方志界也十分注重借鉴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功经验,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方志理论的具体实践。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阿穆尔州等地以人民创造历史为设计建设理念的“地志博物馆”模式,引起了我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文化部便决定以此为新中国综合性博物馆的建设模式和发展方向。当年10月,文化部在下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民主建设’、‘历史发展’三部为陈列内容。”1956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暨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交流会指出:“如果一个省地志博物馆不按照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设三部分来陈列,它就不可能全面地介绍一个地区的各方面情况。”^④当时全国所建30多个地志博物馆,主要由当地“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就)等三部分内容组成。这与以往传统博物馆的展陈理念和内容相比具有重大变化,显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念的重要影响。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傅振伦在发言中谈到当年上述地志博物馆的3个主要展陈内容时指出:我以为新编地方志也可以

① 参见张炳安:《毛泽东主席谈〈荆门市志〉》,《黑龙江史志》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0页。

③ 参见赵庚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地方志》,《福建史志》2003年第6期。

④ 参见王治秋:《在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发言》,《王治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19页。

采用这种方法,分这三部分。^①“当代修志要全面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和革命建设等现状,就要求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②由此同样可见唯物史观对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一脉相承的重要影响。

(二)“厚今薄古”观对新方志编研的干扰影响

论及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创立与发展,还不能忽视20世纪50年代末笼罩在史志界的一片“阴云”——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观。1958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以高校、学术界为主,全国开展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3月10日,在国务院学科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作了一场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专题报告。他在批评学界常常对“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后明确提出:“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我们应该面对现在,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③从而把是否尊崇“厚今薄古”上升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客观上人为形成了两者的对立。次日,《人民日报》也作了专题报道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时学术界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现象:不管出于何种心态和何种状况,包括郭沫若等大家都对“厚今薄古”观基本持赞同态度,如吕振羽就在当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一文,为此学界后来将这一时期视为“历史学大跃进”现象。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就有不少置疑声,陈寅恪、顾颉刚是其中的代表。以至1959年5月,陈伯达在《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讲话中,主动承认“厚今薄古”作为“口号和公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现了“把这个口号加以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并明确表示:“我原先没有把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是要由我负责的”^④。因此,回过头来看,由于“历史学大跃进”“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最终“非但没有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当时以及后来史学政治化的问题不断衍化升级,以致出现‘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与历史学大跃进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⑤。

问题在于,这一观点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地方志编修工作。1958年10月,在当时全国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就明确提出“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⑥。由于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地方志编纂的第一个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的文件,从而对地方志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其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地方志事业发展也有严重的后遗症,必然也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探索与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初创与发展

回望建党百年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国地方志事业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才能得以传承延续并持续发展。但同样可以肯定,与以往近60年

① 参见潘捷军等编著:《中国方志馆》,方志出版社,2016年。

② 傅振伦:《谈编修新方志的几个具体问题》,《中国史志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

③ 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红旗》1959年第13期。

④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历史教学》1959年第8期。

⑤ 储著武:《“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

⑥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来乃是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建设真正起步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概念首倡与研讨

改革开放初期,方志界已敏锐意识到:“新方志能不能写好,指导思想是个关键问题”^①,因而指导思想如何确立,正确与否,是事关方志编修、理论研究和整个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能否建立的重要前提与理论基石。

1981年,朱士嘉首先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环。^②当年在全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上,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任会长梁寒冰以已有约60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参照系,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③,这些应是方志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概念的最早记录,并开始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例如1983年,刘光禄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则是学界第一篇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论文。此后,邵煜、姜万成、齐放、金紫衡、徐振田、刘柏修、甄人、薛艳伟等学者,相继围绕这一命题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开展系列研讨。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概念一经提出,不仅立即引起关注,而且还产生了轩然大波。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论见显然过于偏颇,但却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学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从产生到发展均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实践检验成为真理共识的客观进程。例如:

——齐放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一文中提出,并非所有专业学科名词前都能冠以“马克思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学”,因而也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对此徐振田旗帜鲜明地回应此为“概念不清,归属混乱”,并以“事实上早就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等科学提法”为例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唯物论,方法论是辩证法……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或称学科),其中也应包括方志学”,因而“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是不能说服人的,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的批判更是不妥当的。”^④

——针对当时“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为时过早,不现实”的观点,邵煜也针锋相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一种理论的建立,有它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像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这样系统的理论,需要一个由草创到成熟的过程。”^⑤

——针对陈伯达“厚今薄古”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魏桥在梳理分析方志学界“详今略古(远)”编纂原则历史传统基础上,明确提出“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对待历史”的“详今明古”观,即志书编纂时处理古今关系的关键不在于“详略”甚至厚此薄彼,而在于“明晰”,从而以更为辩证的理念澄清了这一认识和实践误区。^⑥

① 史念海:《怎样写好地方志》,《史念海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② 参见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2期。

③ 梁寒冰:《梁寒冰同志的讲话》,《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④ 徐振田:《坚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继续奋斗——兼与齐放等同志商榷》,《广东史志》1994年第3期。

⑤ 邵煜:《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

⑥ 参见魏桥:《关于“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3期。

——甄人从另一个角度发文认为，按历史发展顺序划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有3个来源：古典方志学、现代方志学和当代为探索这一理论体系而积累的有关成果，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并不排斥其他方志学。相反，它要从古典方志学和现代方志学中吸取其理论成果”^①。从而在两者的结合上，为这一命题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另一种视域和融合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指导思想探索确立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即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编纂实践，业界既注重尊重传统、遵循历史规律的一脉相承，又注重结合各时期发展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如方志界陆续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修志工作”^②；要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江泽民同志讲话 加强新志书薄弱环节”^③；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志编修”^④，等等。当然，有的未必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研究专论，但它们都力求以此立论，注重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各阶段的地方志事业相结合，以求在探索中循序渐进，与时俱进，因而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探索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和标志。

（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指导思想的确立

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学术争辩，客观上促进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建设进程，但这并非是决定性因素。考察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指导思想是否确立的重要标志是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如史念海认为：“当前纂修方志和以前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纂修的”^⑤。董一博进一步指出，如何在修志工作中体现马列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编纂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和一切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⑥傅振伦说：“我认为现代方志与古代方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指导思想上，真正的现代方志应始终贯彻唯物史观思想。”^⑦这也表明，随着修志实践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探索目标日渐清晰，认识渐趋一致。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⑧，是习近平同志1989年在福建宁德地方志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也是新形势下针对地方志工作的新发展。他还曾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道理。”^⑨正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因而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核心要旨，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能否成立的试金石。如果把地方志工作实践和事业发展视为不断攀越高

① 甄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② 袁培钢：《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修志工作初探》，《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5期。

③ 李山锦：《学习江泽民同志讲话 加强新志书薄弱环节》，《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2期。

④ 程林章：《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志编修》，《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⑤ 史念海：《方志的纂修和对于自然与社会演变规律的探索》，《史念海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2页。

⑥ 参见董一博：《对修志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国地方志》1984年第4—5期合刊。

⑦ 林在勇主编：《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⑧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宁地委办〔1989〕52号）。

⑨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3期。

峰,那么正确的指导思想就犹如指引前行方向的灯塔。

我们之所以把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鉴于唯物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指导价值。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有三种指导规律:一是对社会发展一切阶段都起作用的普遍(一般)规律,二是对某一类型社会(如阶级社会)所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如阶级斗争),三是仅对某一时期所起作用的个别规律。而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①则是“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探讨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②,即是对社会发展一切阶段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为此列宁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③。

二是鉴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唯物史观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它的形成。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重大命题作了重新审视和诠释,有的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新论。如“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⑤,等等。从而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了对这一学说的认识。“历史证明,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能否坚持或在何种程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与如何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内容。”^⑥也正因为“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思想武器”^⑦,因而“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⑧。

三是鉴于史志间的相互联系和密切关系。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地方志总体上属于历史研究范畴,方志学目前仍属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⑨,而志书(尤其是贯通古今的“通志”)上限一般起于历史发端,下限止于现(当)代,所记载的历史往往长达数千年,其跨度之宽,容量之大,历史之漫长,关系之复杂,如果没有一种指导思想统揽全局,很难定位。又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⑩,而不仅仅是指导某一具体阶段的理论和探讨解

① 学界一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本是同义语,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两者间也有细微差别。现基本采用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互用方法,具体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② 萧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④ 孙伟平等:《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述》,《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杨耕:《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再思考》,《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⑥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力作》,《光明日报》2013年5月8日,第13版。

⑦ 引自《习近平同志2018年4月23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4/24/c_1122733802.htm。

⑧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3期。

⑨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⑩ 《习近平同志2013年12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4日“央视网”
https://tv.cctv.com/2013/12/04/VIDE1386155767060339.shtml。

决某一具体问题的方法,因而它对志书编修和方志学研究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

四是鉴于革除旧志所存弊端的迫切需要。地方志虽是我们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它毕竟脱胎于封建社会,且至少已受其上千年影响,因而传统旧志及所遗留下来的修志传统既有精华,更有糟粕。正如黄苇所言:“旧方志是在封建时代编成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即使是民国年间修成的方志,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一指导思想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决定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方志按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意志,通过记人载事,宣扬三纲五常,表彰忠孝节义,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以巩固封建制度和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我们的新方志绝不能用封建主义的旧思想,而必须以崭新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进行编修。所以编修新方志,对于旧方志来说,在指导思想上,不存在继承和发扬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予以更新的问题。”^①从而旗帜鲜明地界定了新旧方志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也阐明了之所以将唯物史观视为新方志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三)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与具体应用

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建立和地方志工作具体实践中,能否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根本,是前提。有了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可以确定相应的编研理念和工作方法。而且,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同样需要通过具体实践来加以检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建立的丰富实践性和程序严谨性。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精辟思想,被恩格斯视为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最为“扼要的阐述”,也被列宁视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这个《序言》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等唯物史观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奠基性、决定性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影响了当时学界和整个社会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方志编纂实践的指导,主要也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如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书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五大部类的划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涉及的自然、经济部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所涉及的政治、文化部类,“民族和民族关系”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关系”所涉及的社会部类,等等。因而唯物史观与地方志内容所具有的必然联系,使上述内容成为地方志最为重要的基本范畴,从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探索的学术科学性和实践契合度。

2011年,笔者曾将《地方志工作条例》所提志书编纂“全面、客观、系统”的三个要求,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志体所提“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的三方面规范,综合归纳为地方志书编纂的三大原则,即:“全面”地“横排门类”,“系统”地“纵述史实”,“客观”地“述而不论”。^②同时笔者也发现,这三大原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视域同样密切关联,从而也说明,唯物史观不是大帽子、空架子,它对地方志书的编纂指导具有内

① 黄苇:《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6期。

② 参见潘捷军:《全面客观系统:论志书编纂的三大准则》,《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8期。

在逻辑性和必然性。例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既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立论，同样也是志书编纂的基本前提，因其实际涉及如何“全面”地“横排门类”的问题。为此，傅振伦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修志者必须重点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以及经济生产活动”^①。刘光禄也认为：社会主义新志编纂应“充分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把人们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作为志书的重点内容。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②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中，按“详今明古”理念，与以往旧志相比，各地的新编志书首先在内容门类和篇目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鉴于此举已成为各地两轮修志的普遍做法，同时因限于篇幅，具体不再举例（下同）。

——学界几乎都关注到“阶级社会阶级斗争”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视域，这其实又涉及志书主线主脉编纂理念即如何“系统”地“纵述史实”的问题。一方面，针对旧方志“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略而不谈”的弊端，笔者就曾撰文分析认为：就社会形态而言，人类社会至今已经历了5种不同质的生产关系，以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关系比重。相应从时间比例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系一种非典型社会形态）也书写了至今为止包括中国在内人类社会的主要历史。显然，这部分历史就其性质和所占时间比例而言，基本是阶级社会史。相应志书编纂中，在阶级社会中，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③因此，“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是编纂志书和研究方志学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和方法论。”^④另一方面，学界也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即便是在阶级社会，也不能把所有的人类活动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特别在现阶段，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强调和扩大阶级斗争，同样修志者“遇事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应力避简单化、公式化和概念化”^⑤。从而反映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探索过程中实事求是的辩证学风。

——“人民创造历史”既是唯物史观的一个主体理念，同时又又是从一个侧面对新方志如何体现“客观”地“述而不论”编纂原则与方法的具体检验。对此，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历史也好，方志也好，它是人民的历史，是集体智慧的历史，新修方志一定要生动地反映出来。”^⑥因此“新方志的内容当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主……要为农民领袖、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著名人物树碑立传。下至昔日被视为‘小人物’的‘细民’，只要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入志。”^⑦但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方面，学界在重新审视和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新方志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同样关注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

① 傅振伦：《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② 刘光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潘捷军：《从唯物史观看方志的“政治”意识——兼论“通志”编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④ 刘光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2期。

⑤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4—315页。

⑥ 傅振伦：《司马迁是怎样编写〈史记〉的》，《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

⑦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用”，因而“在对待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问题上，要注意区别唯物史观和英雄史观，这也是社会主义时代志书和旧志书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上述这些理念思想不仅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探索的正确路径，同样也在全国各地两轮大规模修志实践中得到了具体应用和检验。当然，学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并不仅限于这几个理论视域。同时由于篇幅所限，一篇论文也不可能就所有相关问题展开详细叙述讨论。但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由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也是与史志学科和实践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关键要素，因而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余 论

早在1984年董一博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理论是一个重要也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但由于实践和理论建设都不足，现在提出比较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体系为时尚早。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主客观各方面条件基本具备时，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一定能够建立起来。^②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方志学理论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传统方志学、现代方志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三个阶段。”^③其中第三阶段的论断是否成立似可商榷。因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创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要经过许多人以至几代人的努力。”^④因而“要建立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不能简单地套用一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各门学科的知识，需要大家群策群力。也正是从这点上讲，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比任何一门单一学科理论的建立都要复杂得多。”^⑤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看，即使发展到今天，实事求是地看，具有规范要素和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恐仍未真正建立。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肯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同样可清晰发现，唯物史观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地方史志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业界正本清源后的基本共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学界已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并相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如果承认这一结论，那么我们离最终目标已不遥远。但能否如期达到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要取决于业界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对此，我们既寄予厚望，更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刘光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2期。

② 董一博：《对修志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5期合刊。

③ 薛艳伟：《傅振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④ 甄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⑤ 邵煜：《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